

论阿Q和他的悲剧

王西彦著

新文艺出版社



論阿Q和他的悲劇

王西彥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收容在這本書里的十八篇文章，廣泛地談論到魯迅的重要作品，如小說“阿Q正傳”、“藥”、“故鄉”、“祝福”、“傷逝”和“故事新編”，回憶“朝花夕拾”，等等。在“論阿Q和他的悲劇”一文里，作者對“阿Q正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論‘故事新編’”一文里，作者從魯迅思想的發展，闡述了這部歷史小說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在關於“朝花夕拾”的幾篇論文和雜記里，作者從魯迅的童年生活，說明了魯迅戰鬥性格的形成。此外，關於魯迅的生活和工作，以及研究和學習魯迅等方面，作者都根據自己的體會和理解，有所論述。

論阿Q和他的悲劇

王西彥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488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9 13/16 字數 177,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9,000 定價(7) 0.85元

目 次

論阿Q和他的悲劇	1
從“葯”看魯迅創作的特色	35
讀“故鄉”	53
“祝福”——一個令人顫栗的回顧	64
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	77
也談關於魯迅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的問題	96
讀“傷逝”	114
論“故事新編”	130
讀“朝花夕拾”札記	171
叛逆的和尚和復仇的鬼魂	190
純朴的詩	199
狼的奶汁	210
關於學習和研究魯迅的二三問題	216

鲁迅创作小说的时代意义	247
鲁迅的爱国主义	264
跨越自己	277
生命和工作	289
象这样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295

論阿 Q 和他的悲劇

1

作者寫出作品，把它送到了讀者的手裡，這作品便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包含在這種客觀存在的作品裡面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可能跟作者最初的主觀意圖或動機不完全一致。所以，當我們評論作品時，應該分析客觀存在的作品本身，從作品本身得出結論。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我們面對作品時，就完全用不到去探索作者的意圖或動機了。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下，作品總是作者的創造物；對作者的意圖或動機的探索，看一看客觀存在的作品跟作者最初的主觀意圖或動機的距离（如果有距离的話），不僅可以增加我們對作品本身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們對作者的了解。阿·托爾斯泰說：“寫作的過程——就是克服的過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從作者最初的創作衝動，通過題材的選擇，人物的刻畫，到作品最後的完成，這是一個很複雜也很艱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每個作者的經歷雖然都不盡相同；但對作者的了解，總是有助於對作品的了解的。

我們研究和評論魯迅的代表作品“阿Q正傳”，當然也應該這樣做，而且已經有人這樣做過了。一則，現在距離“阿Q正傳”的寫作年代還不算太久遠，當時歷史和社會環境的情況還保留在我們的記憶里，參考材料也比較多；再則，魯迅自己對“阿Q正傳”和它的寫作情況也有過一些解釋和記述，在寫作“阿Q正傳”的同時，也還寫了另外一些可供參考的作品（包括小說和雜文）。這就給了我們很多方便，我們當然應該充分利用這些方便。

什麼是魯迅寫作“阿Q正傳”最初的意圖或動機呢？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過了——是為了揭發“國民性”。魯迅自己也說得非常明白，他在寫於一九二五年的“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里說道：“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又說道：“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我也只能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在一篇題為“再談保留”的雜文里，又說道：“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為了改變愚弱的國民精神而從事文藝運動的魯迅，這樣的寫作意圖和動機是非常自然的。我們知道，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有過深刻而獨到的研究，他認為從歷史可以看到中國的魂靈和推測國家的將來；同時，他又是抱着熱烈的希望經歷了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革的，結果，黑暗的现实使他的

希望沉落为絕望,但又感到“絕望之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不甘心自己思想中的黑暗,要和这种黑暗作“絕望的抗战”,从而轉生出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国民性”的看法,是深刻的,但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悲觀阴暗的色彩。在鲁迅初期的杂文里,揭露和批評这种愚弱的“国民性”的地方是很多的,又往往出于悲憤的口吻,例如在題为“杂忆”那篇文章里,指責受强者蹂躪的人民不敢向强者反抗的卑怯行为时,說:“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么呢?”所以,在“兩地書”里面的一封信里,他慨叹“二次革命”失敗后比“民元”时更其“坏而又坏”的情形,認為問題的關鍵便在于“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主張“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換,貨色照旧,全不行的”。作者的認識既是这样,那么,当他提起那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笔来写“阿Q正傳”时,那意图或动机,不是非常明白的嗎?

在这里,我們还應該特別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帶有悲觀色彩的看法,一方面固然是根据对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却究竟是根据切身的經歷,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眼前所經過的中国的人生”。不用說,在写作“阿Q正傳”以前,从鲁迅眼前所經過的中国的最大的事件,是辛亥革命。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令人失望的;这种失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令人失望。“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

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廢得很了”。這是他自己寫在“‘自選集’自序”里的話。辛亥革命的失敗，在當時的魯迅看來，便是由於“國民性”還沒有改革的緣故。這種必須加以改革的“國民性”，雖然有它一定的歷史淵源，但在辛亥革命中的可悲哀的表現，終究是一種最實際的感触。因此，一方面為了揭發“國民性”，另一方面也為了寫出辛亥革命的實際；或者說，通過辛亥革命的實際來揭發“國民性”。就是懷着這樣的意圖和動機，魯迅寫下了他的傑作“阿Q正傳”的。在一篇題為“論睜了眼看”的雜文里，魯迅說過這樣沉痛的話：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接着，便說到了文藝：

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它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

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
鬪將。

這些話雖然說在寫作“阿Q正傳”之後，卻正可以說明作者在寫作“阿Q正傳”時的心情。因為痛心於用“瞞”和“騙”掩蓋着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的“國民性”，所以魯迅就以一個凶猛的鬪將的姿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揭去“瞞”和“騙”的掩飾物，正視人生並且寫出它的血和肉來。“阿Q正傳”便是在這樣的意圖和動機下所寫出來的揭露性的作品。

2

魯迅的目的既然是在揭發“國民性”的弱點，要寫出“國人的魂靈”，那麼，他為什麼要選擇阿Q這樣一個赤貧的雇農來做他的主人翁呢？正如有一位研究者所曾經提出的，為什麼不採取一個別的人，例如一個普通的官吏或外交官，一個地主或士大夫的子弟，一個得意的買辦或能干的西崽，一個什麼教授或學者來做暴露或鞭撻的對象呢？果戈理的“死魂靈”和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不都是那麼做的嗎？那研究者的回答是，因為作者和農民有更早和更深的因緣，更關心農民的命運，尤其是因為敏感到當時革命的問題在於農民的是否覺悟和發動起來，所以他更希望和更為着

农民，也更伤心于他們的弱点。这个回答，我以为是很确切的。魯迅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选集’自序”里，曾說到自己因为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从小就受着古書和师傅的教訓”，把劳苦大众看作幸福的花鳥：

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間或和許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們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鳥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說，尤其是俄国、波蘭和巴尔干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許多和我們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見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將所謂上流社会的墮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这段話里所說的“古書”，便是那些“瞞和騙的文艺”；同时，因受俄国、波蘭和巴尔干諸小国的文学的启发所写下来的揭露上流社会的墮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短篇小說，“阿Q正傳”当然也包括在內。从魯迅自己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出他和农民的关系，对农民的深厚的同情，以及提笔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因为接近农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同情他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所以，在看到农民的弱点并且为之感

到伤心时，也必然地会注意到农民的要求——即使还不能明确地看到农民的力量，也总是对他们寄托着希望，这也便是鲁迅自己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对农民的了解和关心，自然也就不可能敏感到当时革命的问题在于农民的是否觉悟和发动起来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們也不能忽略鲁迅对历史的研究。因为不满一般历史記載上的“涂飾太厚，廢話太多”，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察不出真实底細，他便从野史和杂記去窺看历史的真面貌。在鲁迅初期的杂文里，也时常发表他研究历史的心得，例如在题为“灯下漫笔”那篇文章里，他写道：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鮮的。中国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战时連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盜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該被杀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盜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們怎样跑。

根据这样的情形，鲁迅便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归納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

循环。不用說，这样的看法是过于阴暗的，但也就說明了兩点：其一，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專制統治的压迫和杀掠，是极端惨重的；其二，这种長期的殘酷的統治，使人民安于被压迫被杀掠的奴隶的地位。可是，魯迅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的这种有些偏頗的看法，显然是由于他对中国人民历来的悲惨遭遇的激憤，在他忧伤的眼睛里，是閃現着悲痛的泪光的。正因为从历史中看到了老百姓受压迫和被杀掠的陈述，所以魯迅在当时的革命問題上，注意到农民群众的現狀，把农民群众的是否覺醒和革命运动的是否联系到广大的农民，作为衡量革命成敗的标尺。在那篇写在“阿Q正傳”以前的“药”里，也写到了愚昧的群众，虽然那些群众并不是农民，但意义却是相通的——如果没有群众的覺醒，如果革命运动没有联系到群众，革命就不能成功。

此外，自然也跟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如象魯迅自己所說的。关于受俄国、波蘭和巴尔干諸小国的作家們的影响，魯迅曾經在好几个地方重复地提到，还說明了自己最喜愛的外国作家，俄国的是果戈理，波蘭的是显克微支。我覺得，如果就“阿Q正傳”來說，显克微支的小說“炭画”，可能是給了魯迅較大的启发的吧？被描写在“炭画”里面那个受愚弄的农民勒巴，自己給村会的書記騙去代替村長的儿子服兵役，妻子为了救他的緣故也受到了村会書記的糟蹋，他却老是喝得醉醺醺的，最后竟用斧头砍死了妻子，放火燒掉一个乡紳的公館的房屋。也許是穿凿附会吧，我以为阿Q

的地位很有些跟勒巴相似，出現在“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之流的人物，也可以在“炭畫”里找到他們的同伴。顯克微支写出了勒巴被壓迫被損害的情形，写出了他的胡塗麻木，但也写出了他的反抗——即使這種反抗有時出于一種被歪曲的形式。這些，我以為都可能對魯迅的寫作“阿Q正傳”起一定的啟發作用。

但不論是從歷史研究中看到了老百姓可悲憐的地位也好，從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的文學作品接受影響和啟發也好，對魯迅選擇阿Q這樣一個赤貧的雇農來做自己的主人翁這一點說，只有作者直接熟悉和關心農民，對農民的受苦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時對農民的弱點又感到巨大的悲痛時，才是有意義的。而且，一個作家的創造人物，往往不能離開一定的實際的模型，即模特兒。這種模特兒，即使魯迅曾經說過，他在寫作時“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是“拼湊起來的腳色”；但也必須“拼湊”到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形象，才能使寫出來的人物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存在。所以，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魯迅說到他在提筆寫作以前，“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好幾年”。到後來，在“寄‘戲’周刊編者信”里面，他補充說明阿Q的形象道：

我的意見，以為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

狡猾。在上海，从洋車夫和小車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瘟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圓形的东西，將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我們只要仔細地体味这一段話，不仅可以領会到魯迅“拼湊”人物形象的努力，和这种努力所达到的程度，也就可以解決阿Q是不是农民的典型的問題。魯迅所以要選擇一个农民来做自己的主人翁，原来是有着这样深厚的实际生活的基础的。也正因为这样，因为熟悉农民，关心和爱农民，在“拼湊”人物形象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这个形象在自己心目中存在了好几年，所以魯迅写作“阿Q正傳”时最初的意图或动机虽然是为了揭发“国民性”，結果却写出了—一个輝煌的永存的典型。

3

魯迅既然選擇了一个赤貧的雇农阿Q做自己的主人翁，要在这个主人翁身上来揭发和鞭撻“国民性”，那么，必須把他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跟他周圍的人发生一定的糾葛。舞台上即使有所謂“独脚戏”，但那一个出現在舞台上

的脚色，也还是从周圍的环境里受到感触或刺激，才有“戏”可做。阿Q当然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的，他是一个农民，便有一个农民的社会环境。这样，跟随着阿Q的性格的发展，他的弱点的显露，也就展开了他所生活着的那个社会环境的全面的图画——不仅出现了赵太爷和錢假洋鬼子們，也出现了王胡、小D和吳媽們；不仅有了革命党造反，也有了赵太爷家遭搶；等等。因为，必須有着这样的社会环境，阿Q才能到赵太爷家舂米，給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敲头，跟王胡和小D打架，向吳媽下跪求爱；也才能想去投革命党参加革命，結果却被当作搶犯到鋪在地上的紙上去画圓圈。总之，如果說阿Q是一个“英雄”，他就必須有他的“用武之地”。

就是通过阿Q这块“用武之地”的描写，作者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一幅鮮明而真实的历史图景——在阿Q生存的当时的中国农村中复杂的阶级关系，属于各不同阶级的人們的动态，尤其是那一場革命运动的換湯不換药的景象，等等。單就这一点說，“阿Q正傳”便是一部最好的历史教科書。当时大体上还是一个进化論者的魯迅，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的研究（虽然也有偏頗之处），更由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观察；他在“阿Q正傳”里对辛亥革命的弱点的描写，將永远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感激。在初期一篇題为“忽然想到”的杂文里，魯迅慨叹于“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华民国”，“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

就受了奴隶的驅，变成他們的奴隶了”“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灭了”后，接着写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給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經失傳了”。其实，这样的“民国的建国史”，已經由鲁迅自己的笔写下了第一章，它便是“阿Q正傳”。有了这第一章，“民国的来源”便永远不会失傳。

阿Q就是出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的。不用說，这样的历史背景已經够暗淡了；而阿Q，便在这暗淡的背景前面，扮演了一場更加暗淡的悲剧。对于阿Q，我們的作者簡直是很殘忍的，用了一章“优胜記略”和又一章“續优胜記略”的篇幅，便把他那种可笑的精神胜利法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使“阿Q”成为一个永远被嘲笑和受憐憫的名字。我們在讀“阿Q正傳”时，最初，总是压制不住对阿Q的嘲笑和憐憫的吧？看見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便手舞足蹈地把自己封为赵太爷的本家；跟別人口角的时候，便瞪着眼睛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对赵太爷、錢太爷的大受居民的尊敬，他却想：“我的儿子会闊得多啦！”进了几回城，却看不起城里人的把“長凳”叫做“条凳”，煎魚用葱絲，同时更鄙薄乡下人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自己頭皮上生着癩瘡疤，便不許別人說“癩”以及一切近于“癩”的音，有人犯了他的諱，“口訥的他便罵，气力小的他便打”，打不贏便采用怒目主义，罵人家“还不配”生癩瘡疤，而且以“我就算被儿子打了”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又用“人打畜